

2011-11-25 李薇

在日本议员会馆的演讲稿

《我看中日关系》

前言

大家好！

一个多月以前，在座的古川先生、大久保先生作为日本经济同友会中国委员会代表团成员访问了日本研究所。根据他们当时的意见，我利用 11 月底来日本开会的机会，就中日关系与大家交流看法。我知道，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关心中日关系的人非常多，因为我们中日两国毕竟是“不能搬家的近邻”。

首先介绍一下我所在的日本研究所。日本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36 个研究所中有关国际问题研究的 8 个研究所之一，这 8 个所包括：1 个全球问题综合研究所、5 个区域研究所、2 个国别研究所即日本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在 1980 年经国务院批准，同时成立于 1981 年 5 月，那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30 年过去了，尽管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日本和美国，仍旧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走向世界和开展和平外交具有重要的关联和影响。

在我担任日本研究所所长这些年来，如何改善中日关系，是我最为关心、也最为苦恼的问题。我看到，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往越来越密切，¹相互之间的朋友越来越多；但同时也看到，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双边关系呈现不容乐观的局面，主要表现在安全防务上严重缺乏互信。

¹ 2010 年日本对华贸易和对华出口分别占日本外贸总额的 20.6% 和 19.25%。有分析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直接拉动了日本经济复苏。引自《日本发展报告（2011）》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 年。

我认为，缺乏互信导致了国民感情恶化。几个渠道的舆论调查都显示两国国民感情的下滑状况。尽管我常常感觉到与舆论调查结果完全不一样的友好氛围，不论怎样，30年前，舆论不是今天这样令人不愉快。

我认为，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处在发生巨大变化时期时，是最容易导致对这个地区或者国家产生误解的。中国和日本在这30年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确客观地认识30年来中国和日本，是中日之间消除误会、理性思考的基础。例如，对于中国来说，如何看“失去的二十年”的日本？对于日本来说，如何看经济快速崛起的中国？中国和日本相互之间如何证明并使对方相信自己将继续和平发展？这些都是我们为消除误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今天主要谈我对中国的理解，也会顺便谈到我对日本的想法。

一、孙中山与邓小平，代表着同一个诉求

今年是中国辛亥革命100周年，据我了解，日本也举办了一些纪念性的活动和研讨会。如在长崎举办了中国赠送的梅屋庄吉夫妇与孙文的雕像落成仪式，日本孙文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召开了若干研讨会等。从1895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孙文在海外流亡16年，曾经多次进出日本，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日本逗留，由于被清朝通缉，孙文在进出日本时使用了“孙中山”这个名字。孙文在日本一般被大家用其中国名字称呼，即“孙文”，而在中国更多时候被称为“孙中山”。孙文模仿日本学生服改制的装束被称为“中山装”。

中国辛亥革命的志士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派、革命派的许多志士是在日本相互结识，“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创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日本创刊，孙文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等等。日本之所以成为中国改革派、革命派的造访之地，是因为日本成功地实现了明治维新，成为亚洲第一个迈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当时很多欧洲的思想和著作也是通过在日留学的知识精英从日本传到中国的，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以及社会主义思想。

虽然自 1871 年至 1909 年日本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 11 个不平等条约²，还是有不少中国人对日本心存期待，或以为可以利用日本推翻清朝帝制，或认为可以通过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经验。如何使中国像日本那样也走上工业化道路，是当时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人的追求。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国人对日本的期待彻底破灭是在 1915 年，“21 条”对中日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915 年 5 月 9 日成为为中国历史上的“国耻日”。

大家都知道，1840 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辱和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冲击，积贫积弱的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的民族诉求逐渐形成，那就是国家要独立、国家要富强，要在国际上“以求平等待我之民族”。从那时以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包括长期的革命与挫折、反复探索的改革。但是，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后来的邓小平，所立志的大目标是一致的，（尽管其间的蒋介石、毛泽东领导下的国共两党分别走了不同的弯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诉求。从孙中山到邓小平，在同一条延长线上代表着中国的同一个诉求。

二、中国与日本，目标无根本不同

过去的经历已经渐渐远去，我们只看离我们最近的例子，那就是大家熟知的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再继续被人欺辱是 1840 年以来中国人的夙愿，是经历了无数牺牲和挫折之后仍不能放弃的长久期盼。文化革命和此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背离了中华民族 1840 以来的诉求。中国民众越来越厌恶无休止的“折腾”，人心思定。1978 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华民族的民族诉求确定为国家目标，顺应了民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众之间建立起一种隐含契约。在改革开放的大目标上，人民大众与共产党是完全一致的。中国能够在这 30 年取得成绩，与全社会的这种共识是分不开的。

1976-1978 年的两年多时间，是中国政治路线大转变时期，在邓小平领导下，1978 年 12 月 11 届 3 中全会决定中国要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先后出访日

²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使用的资料。

本和美国³，特别对日本的经验感兴趣，表示中国的改革模型在日本⁴，他曾一再叮嘱陪同前往的中国官员，要虚心地认真地向日本学习。1979年12月前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时，邓小平特别就日本的所得倍增计划虚心请教，并第一次提出中国“翻两番”的目标⁵。1992年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开放的目标即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在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参考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倾斜生产方式”和“所得倍增计划”，以及“国土开发计划”、产业政策引导、国有企业民营化、行业协会的作用、公司治理的经验等。同时，随着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经济系统开放化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民法、商法体系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完善。法制建设方面同样大量参考了日本的经验，日本法学家是参与中国民商法制定过程中最积极的外部力量。⁶

30年来，中国的改革主要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西方学者经常纠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涵义，我以为，过于纠缠这个定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方面，中国要发展就必须主要依靠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另一方面，市场不是万能的，有必要通过国家干预，纠正市场的失败，例如，在提供公共产品、抑制贫富不均、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日本的经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实践上，保证了中国政治体制和公民生活的稳定性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相对于一些国家的做法而言，中国经验显然是比较成功的。前苏联先行政治改革而衰落，中国先行经济改革而崛起。邓小平告诉我们“中国不能乱”，事实证明他说得对。北朝鲜一度批评中国走修正主义道路，现在也开始纠正说法；越南更是积极效仿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⁷其实，“有中国特色”就是有自己的“主体

³ 1978-10 第一次访日、1979-1 访美后再次顺访日本。

⁴ 野村综合研究所《2015年的中国》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2008年，P267。

⁵ 根据冷溶主编的《邓小平年谱》和当时做翻译的王效贤先生的回忆。

⁶ 可以参见中日民商法研究会主编的《中日民商法论丛》以及梁慧星、王保树教授关于中国民商法制定过程的文章。

⁷ 越南社会科学院几乎每年到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每次都是学习和探讨中国的经验。

性”，不简单模仿任何一种现成的政治经济模式，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之所以能够适应全球化而发展自己，是与中国把开放性和自主性相结合的结果。在过去 30 年中，中国一直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外人往往忽略了另一个重要事实：中国也一直在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

中国比日本起步晚得多，中国与日本相比，国家情况复杂的多。日本虽然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进入工业化轨道，但由于走上错误的战争道路，不得不在战后“再工业化”。⁸而日本的“再工业化”经验正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的首位榜样。中国 30 年来所做的事情与日本并无根本的不同，中日两国所走过的发展之路，反映了二战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潮流与现实。

三、 中国继日本，发展承受外部压力

中国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希望在遵守国际规约的同时，得到平等发展的地位。中国先后加入了联合国、IMF、世界银行、WTO、国际条约等；中国还积极参与地区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协调。中国的目标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无根本矛盾，也无意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国的人均 GDP 才仅仅 4382 美元，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很不平衡，工业化目标还远未完成，仍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当年的日本，中国较早地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同时，相对于当年的日本，中国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坚持了一贯的自主性原则。

我们来看看日本的经历。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所占的比重，1950 年只占 1%、1960 年占 3%、1970 年占 6%、1980 年占 9%，然而到了 1988 年，日本的 GDP 占全世界的 14%。自从日本变成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日本便被外国要求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这些来自外部的压力在今天看来，并没有给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日本找到一条有效的出路。

⁸ 我一直认为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除了“战争特需”等外部条件外，是有其内部条件的，即战前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打下的良好的工业基础。日本战后 40 年左右的发展在前期的延长线上，可以称为“再工业化”。

虽然 1985 年“广场协议”后日本调整了汇率，但日美贸易不平衡并没有明显缩小，美国国会的保守主义论调高涨，日本成为冷战后美国 90 年代亚太战略的第一轮对手。1989 年至 1990 年日美之间的“日米構造協議”（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成为日本改革的起点⁹。日本听从改革的建议，目的是避免美国“超级 301 条款”的对日经济制裁。“日米構造協議”后来更名为“日米包括協議”，1994 年发展为美国每年的对日“年次改革要望書”。我们清楚记得细川政权（1993-94）以改革为施政旗帜；桥本政权（1996-98）推动“金融大爆炸”等六大改革；小泉政权标榜“改革无圣域”。“规制缓和”是泡沫经济之后日本最流行的词汇，日本多次修改商法，特别是多次修改公司法，促使日本的公司逐步转向美国型公司制¹⁰，同时放宽了外资并购日本企业的限制。在泡沫经济之后的 20 年里，是日本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时期，来自外部的压力引导日本走上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但是日本人所感受到的却是“失去的 20 年”。

我的看法是，日本在完成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发展后，失去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缺少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后工业化社会出现消费不足，影响到增长和就业，特别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日本的财政在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下却大幅增加了社保负担。当然，这也是所有发达国家遇到的共同的问题。日本曾经多次尝试改革，由于在国家发展方向和道路上没有形成共识，必然缺乏主体性和能动性。这样的改革不仅事倍功半，而且增加了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自信心。¹¹

四、中国于日本，差距仍很大

⁹ 1989-1990 年间，共召开了 5 次美日两国间的协商会议。美国要求日本改革的项目多达 240 项。

¹⁰ 日本传统上把公司看作劳资合作的“生活共同体”，形成日本式经营模式，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为特点。1990 年代的法律修改使上述模式发生改变，促使企业走向发挥经济效率的“功能型组织”，以促进雇佣形式的多样化、人才的流动、外资的进入等。

¹¹ 当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经济危机发生后，日本国内才有人敢于公开批评美国的发展方式，并重新审视自己的道路。例如中曾根康弘就提出“思いやりの資本主義”才是适合日本特色的模式。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需要很长时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距离日本能够保持 GDP 世界第二位长达 42 年之久，还要经受 41 年的考验。如果用 GDP 总量、排放量、增长率、顺差和外汇储备、高楼与汽车来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显然会导致片面的认识和误解。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需要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制度水平、市场水平、技术水平、环境水平等多角度进行综合评价。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差距还很大。这些差距（也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人均 GDP 很低，根据 IMF 的统计，201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为 4382 美元，位居全球第 95 位。日本则为第 16 位，人均 42820 美元，是中国的 10 倍。2、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HDI）反映出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水平低，UNDP2009 年 10 月发布的年度人类发展指数中，中国为 0.772，仅排在世界第 92 位。3、社会制度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仍高于 0.45。4、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较大，短期内难以缩小。5、贫困人口总量还很大，按照最新的标准，还有近一亿人口处在贫困线下。6、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技术和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日本的高速增长效果值得评价，用日本自己话说，就是“完全雇用”、“一億中流”、“超安定社会”，这足以证明大多数日本人对其高速增长的满意度。中国的高速增长，由于国情的复杂，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在缩小地区差距、调整所得分配方面，还需要像当年的日本经验学习。此外，日本的对外净资产在 1985 年底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1989 年底达到 2932 亿 1500 万美元，根据财务省的数据，日本的对外净资产在 2010 年达到 31437 亿美元（251 万 4950 亿日元）。¹²

除了上述日本经验外，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在学习日本方面还应注意以下三点。首先，目前的中国与日本处在不同水平的阶段。中国正处在实现工业化阶段，日本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中国的快速增长与日本已经达到的高度水平两者之间是不可比的。其次，中国在刚刚取得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同时，就已经

¹²按 80 日元=1 美元换算。日本海外净资产已经相当于 2010 年实际 GDP（538 万 5000 亿日元）50%强。

面临一些与日本相似的结构性问题，而日本则是在完成工业化之后才出现这些问题的；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而日本实现了单位能耗最小、环保效果最佳的可持续性较强的生产方式。再次，1990 年代以来的日本对现在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最引人注目时期，同样面临如何对应来自外部的压力的考验。二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会永远高速增长，中国将来也会面临如何实现稳定发展的考验。

五、中日关系，出路在何方

大家都知道，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向中国传递近代思想的同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当日本选择了扩张性的国家发展道路后，中日关系开始变得严峻。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中日关系成为长期以来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与日本打交道，如何处理与日本和其他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决策者难以决断的问题。¹³ 明治维新后至 1971 年的 100 年间，日本与中国的政权基本上是敌对的，直到 1972 年两国邦交正常化后才得以改善。虽然当今的中国与近代史上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如何处理中日关系，仍是中国外交所面对的最重大课题之一。

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我正在建议召开一个中日双边学术讨论会，两国学者应回到恢复邦交时的原点，审视双方共同走过的 40 年，思考如何共同走向未来，就如何坚持双方四个政治文件原则以及如何与时俱进发展中日关系展开坦率的对话。我曾想过一个问题：日本和美国都是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人们却很少把中美建交称为“邦交正常化”。有朋友告诉我：正常化与建交是两个概念，“正常化”指的是从努力实现田中访华到联合声明签署的整个过程，而建交是其终点。正如中日联合声明所称，“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如果说我们的前辈特意强调了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点，那么意味着，中国与日本之间实现建交的过程更值得我们记住。

¹³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用史料记述了 1871 年至 1931 年这六十年中两国外交交涉的详细过程。

中日之间存在三个敏感问题：钓鱼岛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这三个问题的任何一个处理不好，都会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危机。1972年邦交正常化时，有关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在建交的联合声明中已经基本上有了定位；钓鱼岛问题虽然没有被写进联合声明，但在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发布之前以及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缔结前，中日双方的老一辈政治家已经达成默契，在承认双方存在争议的基础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有些日本政治家认为与中国‘不存在领土问题’，不承认两国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有争议，这是错误的，争议是客观存在的。记得邓小平曾经说，这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处理，相信他们更有智慧。可以说，搁置钓鱼岛争议是邓小平冷处理的智慧，为了避免钓鱼岛问题影响当前战略互惠的大局，并最终解决钓鱼岛问题，我们现在应当秉承前辈的智慧，尽快建立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共同危机处理机制。

在“世界大变局”和“东亚新格局”的今天，中日都在思考各自的国际定位，客观地判断自己和对方，才能客观地找准定位。此时，需要中日共同回答一些问题，如：中国与日本有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有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如果分析的结果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中日之间能够维持一种怎样的理性关系？日本在中国的和平发展过程中会扮演什么角色？中国应该推动日本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消除日本对中国的恐惧、使日本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这是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和日本的中国研究者面临的核心问题。

2006年，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被作为一个政治目标写进了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实现战略互惠首先要建立战略互信。我看到，民主党政权的东亚外交调整与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同步。2010年12月17日公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和2011年8月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中国威胁论”的影子随处可见，白皮书还详细描述了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问题，日本欲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联手东盟构筑对华安全战略的意图明显。¹⁴这些动作所发出

¹⁴ 有一位日本战略研究家的文章这样写道：“中国にとって最も懸念されることは、やはり米国が日本とその周辺に介入してくるかどうか点である。そこに日本の安全保障の唯一の活路が見出される。”“日本にとっての最も好ましい選択肢は米国の東アジアへの強い関与と積極的に関わり、これを助けることである”。这是非常典型的傍美观点，谈不上是外交智慧，但是对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之伤害会很大。

的信号给中日发展战略互信关系带来了负面作用，也充分显示出日本对华心存疑虑。

实际上，中国没有威胁他国的主观愿望，也没有威胁他人的客观条件。由于中国的整体形成是历史的产物，近代之前相对封闭，改革从经济起步，经济改革先行于政治改革。因此，中国需要比其他国家花更多的时间应对外界的误判。

除了“中国威胁论”之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所谓“专制集权国家”完全是一种误解。现在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党中央和国务院实行集体领导制。其次，军队对国家有更强烈的责任感，当然需要一个规范的适当表达意思的场合。第三，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确实带给社会道德教育方面以新的挑战。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段也存在过类似问题。30年来中国急于发展经济，对资本主义、物质主义负面影响的反思还需要时间，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了文化建设，目的就是提高道德素质。第四，日本媒体经常提到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我认为这主要是针对双方关系而言。不能否认的是，民族记忆存于百姓中，这个记忆常常被日本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的一些表现挑起，而近些年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有明显的抬头，因此，需要双方共同谨慎地对待。

结语

我认为，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除了受到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逻辑的影响外，也源自于近代以来日本知识精英、政治精英透过对中国的理解来完成对自己国家的理解和定位的惯性。日本近代以来对亚洲身份的敏感度和国力导向的身份意识远高于中国，同时还隐约保留着战前各路思想流派同享的一个默契即东洋与西洋的对立以及日本所力争的欧美话语身份。有学者分析指出，在思想基础上，日本还缺乏应对“中国崛起”的准备，传统的亚洲观和中国观牵制了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认识角度。¹⁵

¹⁵ 《回到亚洲？——日本认识中国崛起的思想基础》石之瑜（台湾大学教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

19 世纪的中国与日本在观念上是一个群体，同属于地理上的东亚和文明上的东洋。当中国一蹶不振时，日本的精英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难以决断。其中包括有要切断关系者、要教化者、要在中国进行世界革命者、要帮助中国驱逐帝国主义者、要占领中国者。¹⁶日本最后选择的道路被证明是错误的。战后日本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为亚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变的今天，日本再次站在如何给自己的身份做出定位的歧路口。

我以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中日同处经济发展最快的东亚，两国相互存在于对方之中，中国和日本只能顺应潮流发展合作互惠关系，这是唯一的出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向、道路、方法可以造福于两国国民呢？

我期待今年 12 月野田首相的访华和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的纪念活动能够营造良好的氛围，为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带来契机。我建议，增加高层交往、搁置争议并建立共同危机管理机制，扩大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开展互利合作，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

今天，在座的很多先生、女士都是到过中国并致力于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我愿意借此机会与大家交流并向大家请教。谢谢。

¹⁶ 参见《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野村浩一，中文翻译版，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